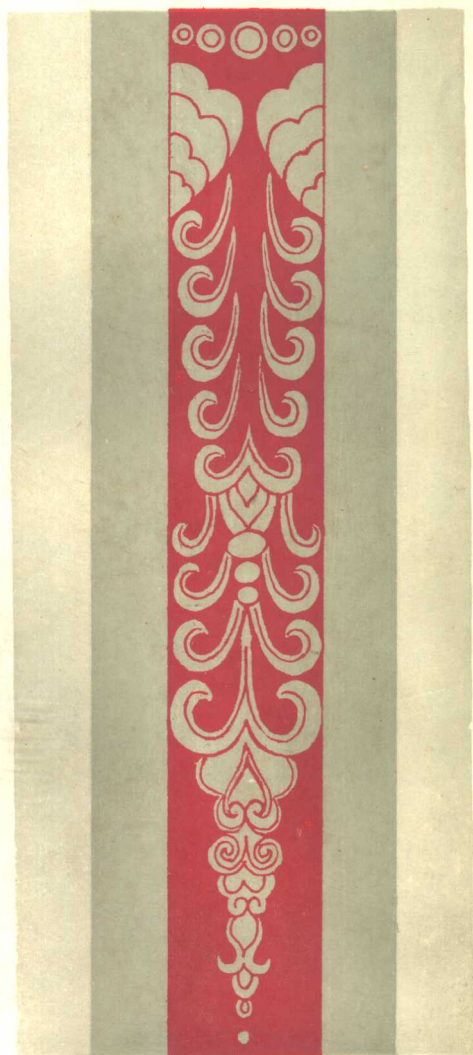


西藏学参考丛书第二辑

入藏纪行

〔日〕多田等观



中州古籍出版社

西藏学参考丛书第二辑

入藏纪行

〔日〕多田等观

中州古籍出版社

西藏学参考丛书第二辑

入 藏 纪 行

[日] 多田等观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许昌县印刷厂印刷

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3.75印张 插页2张 字数80,000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统一书号: 11219·69

定价: 1.50元

· 内 部 发 行 ·



本书的作者与牧野文子氏

第十三世
达赖喇嘛



色拉寺之管长（堪布）

《西藏学参考丛书》第二辑前言

《西藏学参考丛书》创刊于一九八一年冬，是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的四种藏学丛书之一，原为内部学术资料。现应藏学界的要求，分别交付有关出版社出版，并酌情扩大发行范围。

这部丛书的任务是选译国外有代表性的藏学或与西藏有关的著作，为国内藏学提供信息、资料和经验，促进藏学的发展。第一辑共收入有关西藏和藏族的著述十种，即：《无护照西藏之行》（〔英〕F·M·贝利著）、《西藏——宗教、历史、人民》（土登·晋美诺布著）、《英国侵略西藏史》（〔英〕荣赫鹏著）、《西藏的土地与政体》（〔美〕皮德罗·卡拉斯科著）、《智慧的窗扉》（十四世达赖喇嘛著）、《西藏的文明》（〔法〕石泰安著）、《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英〕贝尔著）、《谁是六二年的罪人》（〔印〕曼克尔卡著）、《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法〕达维·耐尔著）和《不丹——静龙之国》（〔印〕梅赫拉著），均已先后成书。其中有的是国外藏学名著，有多种外文译本，在国外藏学界颇有影响；有些书则是典型的反面材料，也值得一看。这十种书除《英国侵略西藏史》外，都是第一次被译为汉文，介绍到国内来的。印行之后，受到藏学界和藏族地区干部的欢迎。第二辑仍将选译十种国外藏学著作，日本学者贞兼绫子的《西藏研究文献目录》，为其中的第一卷，业已印行。其余各卷，亦将次第出版。

古往今来，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相互交流。要发展藏学，也应当这样做。

藏学的故乡和基地在中国。它在国外发展的历史约有一百多

年，一九五九年以后，成了热门学科。有二十多个国家成立了藏学研究机构，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文章。择要选译这些著述，可资掌握信息，开阔视野，丰富资料，取得借鉴，受到激励，有益于国内藏学的发展。从学科建设来说，这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工作。当然，国外的有些所谓藏学家，研究西藏问题有他们特殊的兴趣和着眼点，那也无关紧要，读一读他们的书，也会长见识，使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一些。

善于学习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藏族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大译师和翻译家，他们为发展藏族的文化 and 促进文化交流，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留下了丰富的译著，至今人们仍受其益泽，铭记着他们的卓越贡献。今日藏学研究发展的情况是：国外出版的藏学著作很多，而介绍到国内的却寥寥无几，因此迫切需要更多的大译师和翻译家，长期埋头耕耘，为藏学的发展贡献才能和智慧。

本丛书主编陈家珪，本卷编辑兼责任编辑季垣垣。吕焕祥做了部分编辑工作。

牛力耕述于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译 者 的 话

《入藏纪行》的作者多田等观（1890——1967），是日本研究我国喇嘛教的学者之一。1890年出生于日本秋田市一个僧侣家庭。1912年流亡印度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使者察瓦提托^{〔注〕}高僧访问京都时，多田等观跟察瓦提托学习了藏语，第二年随察瓦提托前往印度，在噶伦堡谒见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1913年从不丹潜入西藏。到藏后经达赖喇嘛批准加入了喇嘛教，在色拉寺习经达十年之久。他是最早一批进入我国西藏的日本僧人之一，同期先后入藏的日本人还有青木文教、河口慧海和矢岛保治郎等，他们归国之后，都有著述，对日本的藏学研究颇有影响。

多田等观入藏期间，正当英国与沙俄竞相侵略西藏时期。多田等观在藏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触频繁，多方受到“特别照顾”。据他在书中自述，他还曾为西藏地方政府策划开征人头税和铸造金币等重大活动，凡此种种都说明，当时正在四出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极力拉拢十三世达赖，企图染指西藏的，也说明多田等观本人不是一个一般的日本僧侣。在西藏地方和中央政权的关系方面，多田等观的观点是错误的，讲了一些没有根据的话，联系多田等观后来担任日本关东军喇嘛教对策顾问的一些活动，他持这种观点不是偶然的。

多田等观在藏期间搜集了很多珍贵经典，并于1923年带回日本，与他先后入藏的几个日本人也带走了不少西藏典籍，这

注：此人生平不详，据分析可能为察瓦赤珠阿旺洛桑，由于无可靠依据，仅按日语音译为察瓦提托。

是我国近代一次重要的藏文文献外流，这些珍贵藏文史料，至今仍保存在日本的有关部门。

《入藏纪行》一书是牧野文子于1985年根据作者的口述进行整理的，1984年由日本白水社出版。此书详细记载了多田等观在藏期间的僧侣生涯和西藏人民的的生活，通过其记述，可以对当时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有一基本了解。多田等观的主要著作尚有：《西藏大藏经总目录》、《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索引》、《西藏》、《西藏选述佛典目录》、《西藏佛画释尊传》、《藏语文法》等多种。

钟 美 珠

1987年于中央民族学院

目 次

译者的话

第一章	西藏和我.....	(1)
	入藏动机——即将再次会见达赖喇嘛——自罗布林卡行宫到色拉僧院	
第二章	喇嘛僧的生涯.....	(18)
	西藏的过去与未来——僧院一日——僧侣生活的欣慰	
第三章	深深印在脑海中的一位西藏人.....	(35)
	十三世达赖喇嘛——观音与阿弥陀如来的化身——正式谒见之礼仪——达赖喇嘛的佛塔——罗桑贡嘎——西藏的食物——两位西藏人	
第四章	朝拜圣地的回忆.....	(61)
	到乍耶巴和甘丹寺的旅行——从彭波到拉登寺和雅隆的旅行——阿底峡——宗喀巴	
第五章	向着太阳的民族迁徙.....	(71)
	西藏的民族——藏语——西藏的建筑	
第六章	西藏的风俗.....	(79)
	一年中的节日——病和死——西藏的美术：工艺与绘画——矿物资源及净土——粪便处理与修行者	
第七章	与古代印度有联系的西藏佛教.....	(97)
	关于喇嘛教	

第一章 西藏和我

回忆起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人藏动机 大约是1912年（明治45年）3月，我在喜马拉雅内地的噶伦堡，第一次晋謁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我才二十一岁。

把我引见给达赖喇嘛的人是大僧正 察瓦 提托，地点在噶伦堡的行宫。该行宫是不丹国王为达赖喇嘛营建的，当时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就临时居住在这里。达赖正值旅行途中，穿了一件黄色藏服。在达赖召见我时，喇门堪布即侍从长兼医生也在场。我首先合起双手向他磕了三个头（关于这种礼节，我将在后面加以叙述）。达赖喇嘛对于一个日本学生能按照藏族的习俗进行礼拜十分高兴，他面带微笑地看着我。我把在京都买来的一套日本式小佛龕、蜡台和花瓶等佛具，作为从日本带来的特产献给了他。

我与达赖喇嘛的这次会见，成为我一生中的关键。这也许是某种奇怪的因缘吧，至今想起来仍不禁感慨万分。当时达赖喇嘛突然听到我用藏语讲话，非常喜悦，便授与我土登嘉措这个名字，以表示我是达赖喇嘛的弟子。能够以达赖喇嘛的一部分名字土登嘉措（　　）来命名，对于藏族来说是一种殊荣，这就象在日本能够以当时天皇的御名睦仁之“睦”字来命名具有同样的荣誉。

接着，他又赐我僧衣、僧帽和僧靴，即把全套藏族僧侣的服装给了我。也就是把当时堪布、即学堂长一级的僧侣服装给了

译者注：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全名为“吉总阿旺罗桑土登嘉措玛旺觉却勒南巴加娃巴桑布”，土登嘉措为其简称。

我。我至今未能忘却的是，这一天他还把装在皮口袋里的克什米尔杏干送给了我，而且是从皮袋里亲手拿出来送给我的。我立刻接了过来，真是太好吃了。

以上是我第一次被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召见时的情形，此后，那个曾经到过日本的叫做提托的人几乎每天都要到我的住处来，目的是让我将有关日本的新闻讲给他听，由他转达给达赖喇嘛。当时，英国政府企图不让达赖了解世界大事，然而，达赖喇嘛是渴望了解清朝革命后中国的现状的。幸好，我手头有日本寄来的报纸，根据这些报纸我得以每天向达赖喇嘛转达新闻，看来他对我这样做非常满意。就这样，我们在噶伦堡同住了两个多月，后来他带着众多的人马，越过喜马拉雅回到了西藏。当他离去时，曾嘱咐我，日后一定要到西藏去，我和他就这样分别了。

※ ※ ※ ※

如果以大吉岭与噶伦堡相比的话，大吉岭的气候要更好一些。而且在噶伦堡会引起英国、印度政府的怀疑，从而可能发生某些不愉快的事情，于是我决定从噶伦堡移居到大吉岭。我在大吉岭租借了一间小屋，雇佣了一名藏族仆人。达赖喇嘛临回西藏前，给我留下了一位叫做霍尔康·扎萨的拉萨贵族，由于藏语中有各种方言，因此他要我向此人学习纯粹的藏话。这实在是达赖喇嘛对我的一片善意。另外，他还留下了僧官赤东·罗多，作我与达赖喇嘛的联络员。我向本愿寺的法主大谷光瑞一一汇报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我这个日本学生的关怀，大谷法主指示我入藏后一定要努力学习。由于达赖喇嘛的邀请和大谷的指示，便开始了我在西藏的生涯。

※ ※ ※ ※

现在，让我首先叙述一下两三年以前的事情。因为这是我开始走向生活的起点。

我的家庭是属于秋田县西本愿寺系统的寺院，当时我的弟弟

在大谷光瑞身边接受着所谓的“英才教育”。虽然我的兄弟很多，但我家并未因为孩子多而穷困。不过，我的双亲也不是富裕到能让所有的孩子全都上学。我的父母认为，如果能让寺院的法主对孩子进行教育就再好不过了。这样，我弟弟在念完小学之后就到了京都。当大谷光瑞听到自己学生的哥哥也在京都时，便对我弟弟说，现在有一个西藏僧人察瓦提托带着两个随从到了神户，不久他们就要到京都来。但是，因为语言不通，需要有一个日本人跟他们学藏语，我希望你哥哥能帮这个忙。当时，我正打算进入高中，也正想作些业余劳动以便半工半读。于是我答应了光瑞师傅的要求。

如前所述，他们虽然是西藏人，但公开却都说是蒙古人，他们讲的话自然也说是蒙古话。当时由于国际关系的原因，在日本非常忌讳西藏人或西藏话。因此，无论是在京都大学或在东京大学，即使在地位很高的知识分子中，也没有什么人懂得藏语或藏文。大谷光瑞是研究中亚方面情况的学者，所以十分关心有关这方面的国外文献，深知西藏拥有特殊的文化。

不久，我们在西本愿寺迎接了公开说是蒙古人而实际上是西藏人的几位客人，并由该寺负责接待他们。我的任务是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教他们日语，就这样我开始了与他们共同起居的生活。过了一、两个星期，我对他们逐渐有所了解，并对他们产生了感情，而他们听说我是日本北方的人，似乎也很满意。后来我了解到，在西藏一说是北方羌塘人，就被认为是朴素而善良的。他们对我表示满意，我想可能与此有关。

至于谈到我自己，当时我尚年青，前途未卜，而他们要求我长期和他们在一起。我想既已如此，也就同意了。但是，这决不是说，我从一开始就抱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一心想研究西藏或专攻西藏佛教。我很理解这三位西藏人在异国他乡是如何的不自由，大谷法主嘱咐我一定要继续下去。这样，我和这三位西藏人

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左右。

光瑞大师为这些西藏人在（京都）六甲二乐庄建造了一幢房屋，自明治43年至44年（1910年至1911年），我一直和他们住在这里。当他们准备经印度回国时，他们劝我与他们同去印度。开始我未表示同意，但他们一再劝我同行，并请求光瑞大师首肯，最后我答应把他们送到加尔各答。但是他们给的钱并不富裕，我边发牢骚，边随他们启程。这是明治45年（1912年）1月的事情。

我们这一行中有察瓦提托僧正及其两名随从，还有研究梵语的学者藤谷晃道、青木文教和我一共六人。这个藤谷先生，在入藏后很长时间未再见到他，我想恐怕只有在九泉之下才能重逢了。不料，后来在我赴任旧金山亚洲研究所教授（1951～1954年）的归途中却有幸与成为夏威夷要人的藤谷先生相会，叙旧畅谈了一番。

从此我便开始了和西藏的联系，成了藏语和日语的翻译，陪同这些西藏人到了加尔各答。

这时，我不仅会讲藏话，也学会了藏文语法。因为三个人教我一个，所以我的藏文进步很快，而由于我的教授，他们也开始会讲一些日语了。

想当初，这些西藏人来日本不到半年时，大谷光瑞准备初次会见察瓦提托，这时察瓦提托用我平时教给他的日语和光瑞大师谈话，谁知光瑞大师一点也听不懂。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察瓦提托所讲的日语是一口地道的秋田口音。那时并不讲什么是标准话。如果是在东京，即使是东北腔^{（注）}也勉强能够通用，但如果是在京都，事情就不同了，每句话都得重新问一遍，这使我感到极大的不快。对于生在东北、长在东北的我，总认为

译者注：

日本东北和出云地方的方言，常有特有的鼻音。

东北腔是纯粹的日语，与其他地方的口音并无任何差别。然而，光瑞大师是个土生土长的京都人，对此肯定感到很为难。他责备我说，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许用日语讲话，干脆用英语讲吧（我的英语是从乡村中学使用的黄皮课本学来的，学完了第五册）。不管怎么说，此后又另外选了一名在西本愿寺的京都人教授他们日语。察瓦提托向我发牢骚说，新来的教师所教的日语比你教的难多了。时间一长，他们三个人一到学习日语的时候，不是这个说有病就是那个请假，不知不觉日语学习便中断了，而我在这段时间里藏语却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些西藏人的到来与其说是为了研究日本的佛教，倒不如说是带有某种外交目的，他们似乎具有西藏外交官的身分。而察瓦提托就是一位具有这方面才智的人物。

西藏代表在日期间，我粗略地学习了藏语，这次我又得到了在大吉岭进一步学习藏语的机会。另外，我应当好好考虑一下用什么办法进藏才好。当时，任何人也无法正当地进入西藏，英国和印度政府把我当成了日本间谍，企图阻止我进藏。

然而，当时已有三个日本人先后进入了西藏。他们是青木文教、河口慧海和矢岛保治郎。

明治43年（1910年），矢岛保治郎曾作为日本力行会的会员试图周游世界，他首先沿长江进入四川，然后经打箭炉与茶叶商人一起进入西藏。但是，由于当时达赖喇嘛流亡在外，四川军队在藏，社会秩序极乱，所以矢岛稍作停留，便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从印度返回日本。至明治45年（1912年），他再次从印度经大吉岭、噶伦堡进入西藏。

当时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西藏。尤其是被看作与西藏人同一人种的日本人，英国当局不问其目的如何都严格加以控制。倘若有某个日本人突破了防线进入西藏，这对守卫国防线的英国官员不啻是个严重的过失。因此，对河口慧

海和我保持警惕亦即理所当然的了。

河口慧海大约比矢岛早十年，他是在明治35年（1902年）经尼泊尔入藏的第一个日本人。他是以拉达克僧侣的名义进入西藏的，接着便到了拉萨。他在拉萨体验了一两个月的寺院生活。由于河口懂点儿医术，为藏人所爱戴，在西藏被称做贝都·阿姆吉。阿姆吉在藏语中是医生，而贝都是他在拉达克的名字。有一段时间，河口一直以贝都·阿姆吉的名字生活，但由于其风貌毕竟与拉达克人有所不同，因而引起了怀疑。河口深知生命危险，便在深夜悄悄逃走。后来，当地政府将庇护过河口的人逮捕入狱，其中有些人甚至被判处死刑。这时河口从印度直接回到了日本。有关这时的情况在东京时事新闻刊载的河口所写《西藏纪行》中有所描述。其英译版以“Three years in Tibet”一名在印度出版，并介绍到海外各国。

此后，河口曾想再次入藏，他在得到安田善次郎的资助之后旅居印度，在贝拿勒斯一面学习梵文，一面不断地寻找入藏机会。这时他得知我在噶伦堡，便也来到了噶伦堡。

河口是我入藏后一年、即大正3年（1914年）夏，再次进入西藏的。他悄悄地到了日喀则，恳求西藏政府让他到拉萨。他虽然未获批准，但他还是到了拉萨。他在拉萨停留了大约三个月后，携带着藏经等物回到了日本。现在这些藏经收藏在东洋文库。

青木文教是西本愿寺大谷光瑞的弟子，他过去曾赴印度各地的佛迹探险。他是大谷光瑞法主的亲信，曾多方照顾过法主，明治45年（1912年）和我一起受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召见。正值另一个光瑞大师的弟子、与青木同门的叫做橘瑞超的人探险中亚之时，青木进藏并在拉萨逗留了约两年时间，研究藏文文法和经典，后返回日本。

回忆起来，自大正2年至3年（1913~1914年）这

短暂的时间内，先后有矢岛、青木、河口、多田四位日本人进入西藏。其中只有我在西藏逗留了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之所以特意关照我，我想是与当时西藏的形势有极大关系。明治40年至41年（1907～1908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正流亡在蒙古。据说当时由于英国远征军侵入西藏，达赖喇嘛才急忙出逃。

英国为何入侵西藏？这与当时沙俄帝国的动向有关。沙俄极力渴望得到本国的自由窗口，他们一是考虑出印度洋的窗口，另一个便是出日本海的窗口。于是便发动了日俄战争。

俄国为了随心所欲地摆布西藏，企图通过蒙古喇嘛之手怀柔西藏。据后来听到的消息说，俄国曾经赠送给西藏不少枪炮等武器。

俄国企图亲近西藏和蒙古，对于在印度扩张势力的英国政府来说显然是件极不愉快的事情。于是英国政府便试图缔结西藏通商条约。但是暗地里依靠俄国的西藏，没有同意缔结条约。这样，英国政府便不得不把签订条约暂时搁置起来而企图进一步接近西藏。英国政府在得到了不同意签订条约的令人不快的答复之后，遂于明治33年至34年（1900～1901年），派遣英国远征军侵入西藏，由于英国远征军的入侵，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国外，达赖喇嘛不太了解世界形势，所以没有什么主张，他认为接近沙俄可能较为妥当，于是首先流亡到了蒙古。据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受到了喇嘛教徒的欢迎与款待。

此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承清朝西太后的邀请，曾在北京紫禁城逗留一周，另外，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也逗留了一周。当时的林权助公使热情地接待了达赖。后来当达赖再次见到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在日本公使馆逗留的几天，犹如回到了自己的家。看来实在是意味深长的回忆。这时大谷光瑞大师曾通过林公使向达赖提出了希望彼此作为佛教徒，能建立交往的要求。当时